

王尧

王 尧

迟到的批判

◎ 大象漫步书系

◎ 大象漫步书系·王 尧

迟到的批判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王尧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2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432-5

I.迟… II.王… III.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1966~1976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752 号

责任编辑:孟建华

责任校对:张静燕

书籍设计:张 胜

出 版:大象出版社

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版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40

印 张:5 $\frac{1}{10}$

字 数:89 千字

印 数:1-3 325 册

定 价:7.40 元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前记

这本集子中的大多数文章是在“迟到的批判——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总题下写作的，因此还以“迟到的批判”作为书名。“迟到的批判”(一)(二)对余秋雨、贾平凹、韩少功、蒋子龙、陈忠实、浩然等作家“文革”时的作品发了点议论，在《东方文化周刊》刊出时，编者在“卷首语”中分别作了评点。1999年第21期“卷首语”议论拙作时说：“本刊‘文化评论’专栏继续对当代作家与‘文革文学’这一命题进行探讨，因为这一探讨的意义，远不止于文本所涉及的几位作家的创作评论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局部梳理，它势必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典型。”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

在这样的阅读记忆中,那些当年活跃的如浩然,崭露头角的如蒋子龙、刘心武、张抗抗、余秋雨、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等,都在新时期以新的状态出现。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怎样看待当时的创作——这是个不能疏忽的话题,因为它涉及的不是对某个作家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从什么样的角度来阐释“文革”、阐释“文革文学”、阐释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来龙去脉。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已经不仅在文坛而且在思想文化界也产生着影响,甚至引导着某种潮流。因此,在对他们怀有种种期待、怀有敬意的同时,不得不怀有某种警惕。

之所以警惕是因为当我面对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种种立场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今天的文化立场是与面对历史的姿态合二为一的。这些作家

在最初写作时也是从复制一种非常态的思想、思维、语言和文体开始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写作不是从确立自我而是从扭曲、剥夺自我开始的。我始终认为这种复制对当代文学、当代思想文化和我们这些在今天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是致命的一击。这种复制甚至在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后来的文学高地的海拔高度。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在复制中我们学习写作与言语,并且在复制中传递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我们是义愤填膺地谴责那个仿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时代,还是以“无怨无悔”状怀念复制时的热情与冲动,抑或对自我与时代作出认真的清算?

十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断断续续的思考,使我重新回到“文革文学”研究这一课题上,并完成了博士论文《“文革文学”研究》。在研究中,我始终想坚持做到的是:坚持“历史原则”,坚持“学术立场”。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坚持历史原则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不坚持这一条,我们不仅无法理解历史,而且更无法解释历史;历史在叙述中被误解或被歪曲是与丧失这原则相关的。坚持学术立场,在学理层面上研究、探讨问题,也是我所企求的,如果没有学术立场,知识分子也就无法称为知识

分子了。

《“文革文学”研究》的整体思路影响着《迟到的批判》的写作。一些在《“文革文学”研究》中由于“体例”“规范”问题或其他原因,无法展开或没有提及的,我在《迟到的批判》中作了一些弥补,因此这本小册子可以看做是《“文革文学”研究》的补充和部分延伸。由目录就可看出,我所分析的对象,大多为新时期一些重要作家在“文革”时创作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多年来又不大为人注意,对大家比较熟悉的如谌容的《万年青》、张抗抗的《分界线》以及张永枚的诗作等,就未作评论。还有一些是根据现在已经公开出版的作家的日记、交代材料等所作的议论。对有些为人疏忽的现象、刊物、事件等,我也充满了言说的兴趣。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思想命运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则是思考的中心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能够出版,应当感谢李辉先生。

目录

前记	1
余秋雨与《胡适传》	1
贾平凹与《弹弓和南瓜的故事》	8
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	11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的创作	18
韩少功与《湘江文艺》	36
陈忠实与《无畏》	42
陈建功与《荷泽惊澜》	46
刘心武笔下的两个“孩子”	52
胡万春与《走出“彼得堡”》	56

俞平伯“干校”时的旧体诗	65
臧克家与《忆向阳》	70
诗歌中的“两个郭小川”	79
天才何以“未完成”	88
《瓮中杂俎》点滴	99
张光年《向阳日记》琐语	103
“正史”之外的叙述	108
《闪闪的红星》:电影对小说的修改	117
关于“白皮书”的另外一种故事	126
一九七二年中国文坛一瞥	134
《文艺批判》:北大的“旧事”	148
《本馆重新开放的文艺书目》小记	157
“文革文学”研究三题	175

余秋雨与《胡适传》

在文化转型时期，历史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许多看似空白的地带或盲点，余秋雨以散文的方式越过这些地带或盲点，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的意义显然已不局限在散文。不管是“我注文化”还是“文化注我”，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认真的，他对人文景观的描绘、对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的探询等努力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后来读《收获》上的《山居笔记》，与读《文化苦旅》的感觉略有差异，但《苏东坡突围》却使我难以释卷。我正在研究“文革文学”，一下子觉得余秋雨所还原、揭示的一些现象恰恰可以用来描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

说到“文革”，我觉得无论是余秋雨他们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些年来不仅面对文化的断层和文化的盲点，而且始终进行文化“突围”，因为我们也曾经有过另外一种文化包围圈和类似于“文革思维”这样的紧箍咒。我愿意在这样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么多年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苦旅”。

在读到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的人物传记《胡适传》后，我的上述感觉格外强烈。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包括余秋雨在内的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从事文化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与逻辑起点，至少在我的研究中是忽视了“文革”、“文革文学”、“文革思维”与新时期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关系。具体到余秋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怎样由《胡适传》——这不单是个人物传记，它传达的是一个特定时期知识分子对新文化和知识分子道路的理解——这样的文章过渡到《文化苦旅》？我们要重新阅读“余秋雨”。

关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我未作详细的研究。余秋雨自己在一篇文章中作过简短的叙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不妨摘录于下：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批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

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都居然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1]

从1975年到1976年,余秋雨有没有写什么,我所知有限,读到的署名“余秋雨”的文章是发表在《朝霞》1975年第7期上的报告文学《记一位县委书记》。

在余秋雨自己看来这段闲居的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先住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的一间小房子里,唐山大地震后又搬到一个古庙里躲避。在奉化他结识了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早年蒋经国读书室的沈老先生,并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读

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后来知道，这些年月，中国政治领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而我则好像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冰冻封存了。”^[2]读到这里，真有些觉得此时的余秋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胡适传》发表于1974年初，如果这段读书经历提前到1974年之前，也许他就不会写这样的《胡适传》了。

《胡适传》写的是五四前后的胡适。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由这些标题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色彩。在传记中，胡适赴美留学被看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胡适在回国的海轮上作“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是：“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对此作者分析道：“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

“胡适差点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对胡适用文言文作《先母行述》，传记认为“闻着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霉腐气息，人们研究可以预感到：从形式到内容，胡适都要算新文学运动的倒账了”。对1922年的胡适，传记的评价是：“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教授’，而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为了替帝国主义服务、替北洋军阀打‘强心针’，他几乎不加任何掩盖了，什么样露骨的论调都能发表，什么样反动的口号都能提出，什么样腐朽的力量都能勾结。”

传记中的这些观点当然不为余秋雨一个人所独有，他只是在一种政治文化中写作；至少在《胡适传》的写作中，余秋雨对这样一种文化的运用笔调是娴熟的，这表明了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余秋雨曾经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余秋雨和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政治文化的运作。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叙事”加“文化分析”的这种“大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写法，在这里已经初显端倪。

余秋雨自己结束了《胡适传》这样的政治式写作。

面对这样的进步，我不能不感慨万千。